

“鸿沟”与“鄙视链”:家庭教育投入的阶层差异 ——基于北上广特大城市的实证分析

刘保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针对日益凸显的中产群体子女的教育问题,使用“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从家庭文化环境、家庭教育支出、课外补习参与和志愿者活动参与4个方面对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家庭教育投入状况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两个阶层内部不同家庭之间在子女教育投入上的差异。研究表明:与非中产家庭相比,中产家庭的教育投入优势非常明显。同时,在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内部,不同家庭之间在子女教育投入上都同样存在着差距,且“教育鸿沟”与“教育鄙视链”并存。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不同家庭的子女教育投入水平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渐变的等级分化序列”。

关键词: 特大城市居民生活; 家庭教育投入; 中产阶层; 阶层差异; 教育鸿沟

中图分类号: C 91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18)02-0008-09

引言

2017年5月25日,《凤凰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中产教育鄙视链》的文章,引发了国人的热议。文中提到,中产阶层的家庭“从孩子出生开始,家长们就精心挑选更好的房子、更好的玩具、更好的早教班、更好的服饰,甚至更好的动画片、更好的旅游地……早在学龄前,因为各种自愿或不自愿的攀比,中产阶级内部就已经形成了一条条育儿鄙视链。”“鄙视链”这一略带戏谑的形容词,让我们看到了中产家长对子女教育的格外重视以及竭尽所能的投入。我国历来具有重视子女教育的家庭传统,近年来随着人力资本投资重要性的提升以及教育市场化的趋势,家庭愈加重视并逐渐加大针对子女的教育投入。“鄙视”的心态使得家庭教育投入似乎正成为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透过“鄙视链”中的多重心态,则可以看到不仅阶层之间可能存在“鸿沟”,阶层内部的分化也在加剧。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产阶层(middle class,类似的称谓还有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等)开始出现和壮大,成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新

趋势。尽管目前对于中产人群的界定、数量和构成以及是否形成了一个阶层等问题仍存有争论,但不论是国家政策、学者专家,还是普通的社会公众,对这一群体的关注都在不断增加^[1]。“教育鄙视链”话题的出现,使得中产家庭的子女教育投入问题得到凸显。本文利用“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从家庭文化环境、家庭教育支出、课外补习参与、志愿者活动参与4个方面尝试分析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在家庭教育投入上的异同,并分析2个阶层内部不同家庭之间在子女教育投入上的差异。

一、文献回顾

(一) 阶层地位与教育不平等

在现代社会,教育是促进社会流动的关键因素。对于年轻人来说,接受高水平的教育,意味着在未来更可能获得理想的收入和地位,而且还可以通过教育非市场化的效果,如改善健康、养育观念、消费习惯、生活方式、个人能力等,来提高个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2-3]。但是,目前大量教育分层领域的研究也发现,教育作为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动力来源,在缓解或者改变着由于出身导致的不平等的同时,

收稿日期: 2017-10-20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上海研究院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刘保中(1983—),男,山东禹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又在塑造着不平等,这是因为上层家庭会利用各种资源优势,确保子女获得较多的教育机会,这使得教育又成为家庭阶层地位优势传递的再生产机制。因此,教育获得的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家庭之间的分布是不平等的。

家庭阶层地位对子女教育获得影响一直是教育不平等研究的核心命题。在“地位获得模型”提出之后,家庭阶层属性对教育获得和代际流动的显著影响作用在许多工业化国家都得到验证^[4]。经济和社会变革带来的教育机会的扩张,也并没有减少家庭阶层背景在个人教育成就取得中所发挥的作用^[5]。MMI(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认为:教育机会扩张会产生平等化效果,但这个效果要到达某个临界点之后才产生,只有当优势阶层的入学率饱和后,家庭背景的影响才会降低^[6]。因此,个人能力不是子女教育成功的唯一决定因素,子女教育生涯背后是一系列社会背景特征。因此,问题已不是父辈特征是否会影响学生教育成功,而是影响的程度究竟是多少。EMI(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则进一步指出:教育不平等包括“数量”(总体教育机会)和“质量”(学校等级或学制轨道)2个层面的差异,高阶层家庭的孩子更可能获得级别或质量更高的教育^[7]。MMI和EMI的理论观点得到了来自中国经验的支持。国内大量研究同样表明:来自更上层家庭的子女,更容易取得教育上的优势^[8-10]。

(二) 家庭教育投入:“教育—阶层”再生产的形成机制

家庭教育投入,或称家庭教育投资(family educational investment),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框架内,通常被理解为家庭花在子女身上的教育费用^[11]。但从广义上理解,家庭教育投入是一个包含了多重面向的概念,既包括了教育支出、物质投入等货币性投入,也包括了教育观念、抚养时间与精力的付出等非货币性投入^[12]。对家庭教育投入的考察,是打开教育再生产“黑箱”的关键钥匙。家庭阶层地位之所以对子女教育获得起着关键性的影响作用,主要就是因为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投入意愿、投入能力和投入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进而影响着子女的教育结果以及在学校的表现。

从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看,西方研究发现尽管对结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是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低阶层和工人阶层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都比不上中

产阶层家庭^[13]。刘保中等人(2014)基于中国样本的分析同样显示:来自更高阶层地位的家庭期待子女获得的学历程度更高^[14]。父母对子女成就的积极性期待对于子女成长过程中的自身期望、学习热情、教育和职业成就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来自“重要他人”的鼓励成为实现代际资源传递的重要影响变量。从物质投入的角度看,高收入家庭比低收入家庭更能担负起教育的成本和物质保障,如居住条件、学习环境、学习费用等等。

文化资本在代际间的传递也是教育再生产的重要原因,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父母,能为他们的孩子创造更多教育文化资源上的优势,以促进子代的学业发展和教育成就^[15]。文化资本不仅包含了教育和知识的积累,还包括了父母的品味、喜好以及对现行教育系统规则的了解等,这些文化资本通过家庭社会化过程在两代间进行习得、传递和内化。国内的研究同样证明,文化资本是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中介变量,家庭文化氛围好,子女也越容易从事促进成绩的学习行为(如课外阅读)^[16]。

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参与行为同样存在着阶层差异。Sampson等(1994)的研究认为:相较于家庭收入和父母教育良好的家庭,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在收入、教育上的劣势削弱了他们提供回应性教养方式(responsive parenting)的能力,更可能会倾向于权威主义的而且严厉的教养方式,更多体罚而非讲道理^[17]。安妮特·拉鲁(2010)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提出:中产阶层(包括上层中产阶层)的父母教养孩子倾向于“协作培养”(concerned cultivation)的文化逻辑,相比之下,工人阶层和贫困家庭的父母倾向于采取“成就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的文化逻辑,“两类不同教养方式的文化惯行并未被重要的社会机构如学校赋予同等的社会价值”,中产阶层家长的逻辑更符合现行教育机构的标准^[18]。

(三) 中国中产阶层的家庭教育投入倾向

中国中产阶层作为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群体,他们的政治态度、消费模式等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涉及。但是针对中国中产阶层的家庭教育投入特征,目前国内文献的分析尚不多见。陈曙红(2008)基于2004年对南京中产阶层所做的调查发现,归于一中路径依赖的思维习惯,凭借教育流动获得社会地位的中产阶层在子女教育中更加注重教育传承意识、艺术素质的培养以及早期教育等^[19]。但是中产阶层家庭表现出来的教育投入倾向是否已经

与非中产阶层构成了教育模式上的差异似乎还尚不确定。洪岩壁等(2014)借助一项全国城市地区中小學生及家長調查數據,運用布迪厄的資本和慣習概念,通過分析城市居民在子女教育上的資本投入和教養理念差異,探討了不同階層之間的教育模式差異。他們的發現:在子代教育方面,中產階層父母在資本(包括子女文化活動參與、家庭藏書量和課外補習情況)投入上有顯著優勢,但在家庭教養態度慣習上卻和底層階層父母無甚差別^[20]。

本文將就中產階層與非中產階層的家庭教育投入問題進行進一步的探討。正如上文所說,家庭教育投入包含了很多內容,採用的劃分標準不同,對家庭教育投入的界定也不盡相同。本文將從家庭文化環境、家庭教育支出、子女課外補習和志願者活動參與4個方面對家庭教育投入進行考察,這4個方面能綜合反映家庭教育投入中客觀環境與實際行為,學業教育與社會性教育等方面的內容。

教育支出一般指購買教育的全部支出的貨幣表現,代表著家庭對子女教育的經濟投入情況。Tilak(2002)認為:家庭教育投資的內容既包括了直接的教育費用,例如家庭付給學校的學費和考試費、註冊費、選課費等其他費用,也包括了一些間接的費用,例如購買教材、文具、服裝、交通、家教等費用^[21]。必要的教育支出是子女獲得教育的基本條件,充分的教育支出可以為子女提供優越的教育條件,可以為子女選擇師資水平更高的重點學校,可以支付起課外輔導費、興趣班等費用,可以使子女在升學中擁有更多的競爭優勢。可以說,家庭教育支出高低背後的潛在意義反映出家庭教育投資能力的高低,以及不同家庭類型的子女當前教育機會的多少和未來發展空間及潛力的大小^[22]。市場化改革以來的教育市場化轉變以及國家教育政策的變化進一步增加了家庭教育費用,在公共教育支出明顯不足的情況下,家庭經濟水平和家庭收入因素對目前中國家庭教育支出的影響作用越來越大。

家庭文化環境是家庭的重要文化資本。良好的家庭文化環境,顯然更容易促進孩子的智力發育、情感培育以及家庭教養等。與直接的教育投入行為相比,家庭文化環境多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產生影響。家庭文化環境包含了多方面的內容,對於這一概念的測量標準,目前學界尚未形成一致的結論。阮福金等人(2006)基於以往國內外相關研究,將家庭文化環境區分為家庭文化資源和家庭文化活動兩部分。其中,家庭文化資源是指書籍、文具和電腦等讀

寫工具,家庭文化活動則包括幼兒和家庭主要成員一起進行的讀寫活動,包含了他們所有的家庭讀寫經驗^[23]。在以往很多研究中,均把家庭藏書量作為家庭文化環境的重要指標^[20-24]。如果父母是喜歡閱讀的人,那麼孩子在親子互動和社會化過程中,容易習得父母的閱讀習慣和愛好。也就是說,父母熱愛閱讀更有可能促進孩子的閱讀行為,培養閱讀的興趣。此外,家庭中圖書等豐富的文化資料增加了子女接觸認知刺激的機會,這種認知刺激有利於激發子女的學習興趣,提高子女的認知能力以及學業表現。由於具有較好的測量效度,本文也選擇了家庭藏書量來反映家庭文化環境的狀況。

課外補習,又稱“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一般指正式的學校教育之外進行的旨在提高學生學業成績等成功表現的一系列教育活動。教育配置的過程決定了課外補習的出現,競爭性的正規考試的存在使得課外補習在很大程度上難以避免^[25]。在很多國家,學校教育和補習教育成為2種並行的教育活動。在中國具有類似的情況。政府主導的國民教育體系和市場主導的校外補習教育構成了中國校內教育以及校外教育資源的2種主要供給^[26]。尤其是近些年“影子教育”發展非常迅速,輔導班、補習班火爆,擴展性的校外教育支出已經成為當前中國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2011年基於全國8個省會城市近5000名中小學生家長的問卷調查顯示,城市家庭在子女中小學階段的課外培訓和補習上投入大量金錢,課外培訓和補習支出的花費成為家庭教育支出的主要內容,76%的家庭年均支付的子女課外補習費達到3820元,其中最高的達到年均8萬元。隨著義務教育在全國範圍內的全面普及,學業競爭已經逐漸從校內擴展到校外。課外補習支出本質上仍是家庭追求更優質教育的表現,它成為獲取優質教育資源的重要途徑。由於受市場邏輯的主導,課外補習參與更容易受到家庭背景的影響。

相比於課外補習等與子女學業教育直接相關的投入,家庭在子女道德教育、社會教育等方面的投入更能反映出家庭教育在理念與形式上的差異。志願服務活動是當前我國中小學生社會教育的重要形式。參與志願者活動具有很好的教育作用,梁烜(2016)認為:志願服務對中小學生核心素養的提高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能促進學生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培養,能鍛煉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提高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關愛他人的意識^[27]。總體而言,在

自我认同感与道德感统一为一体的青少年时期,拥有志愿服务活动的经历,对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28]。在国家层面,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也已经被视为培育学生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方式。2009年6月教育部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教思政[2009]9号),文件中要求“中小学要把志愿精神作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尽管如此,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志愿服务尤其是中小學生阶段开展的志愿服务仍处于起步阶段,学校、家长和学生的志愿服务意识相对薄弱,活动还不够系统。与传统的学习教育相比,全面发展的素质培养教育对家长的教育水平和教育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研究设计

(一) 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由上海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以及中山大学共同主持的“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此次调查于2014年11月—2015年10月在北京、上海和广州3个特大城市组织实施,采用两阶段抽样法:第1阶段采用地图法随机抽样,在每个城市抽取50个社区,每个社区抽取20个家庭户,每个家庭户抽取一个成年人入样,3个城市共获得了3004个常住人口的样本数据;第2阶段是专门针对中产阶层进行的适应性区群抽样(Adaptive Cluster Sampling),每个城市抽取约1000个样本,共获得了3006个常住人口的样本数据^[29]。全部调查总共获得了6010个有效样本。

本文将分析对象限定为家庭中2015年还在就读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子女,考察家庭针对这部分子女的教育投入情况,具体分析内容均由成人受访者回答。由于原数据结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而本文的研究对象和分析单位均是儿童,因此每个儿童应有一个独立的观察值。本文首先对原调查数据的结构进行了转换(即将“宽数据”转换为“长数据”),同时去除不符合就读阶段要求的样本以及各变量缺失值之后,两阶段抽样调查共获得有效子女分析样本1095个,家庭样本917个。虽然第二阶段针对中产阶层的适应性区群抽样并非随机抽取,但出于增加样本量的考虑,在分析的过程中,本文采用了两阶段抽样调查所获得的合并样本。

(二) 变量

本研究将家庭教育投入作为因变量,并从家

庭教育支出、家庭藏书量、孩子是否参加过课外补习、孩子是否参加过志愿者活动4个方面对其进行衡量,这4个方面的测量题项均由成人回答者回答。

家庭年人均教育支出,该变量为合成变量,通过问卷中过去一年家庭在教育方面的花费以及家庭人口数综合计算而来,单位为元,连续型变量。问卷中该问题同时包括了成人和孩子的教育费用。由于问卷中没有包含直接测量子女教育支出的题项,考虑到目前家庭教育支出绝大部分用于子女教育费用上,因此本研究用该变量来近似反映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情况。在回归模型分析部分,为了降低标准差,本文把该变量作了取对数的处理。

家庭文化环境,通过家庭藏书量即目前拥有的图书(不含教科书)册数来测量,在问卷中该变量为连续变量。为了降低标准差,提高模型的拟合度,本文在模型分析部分,把图书册数进一步处理为包含7个类别的序次测度的变量。7个类别分别是:0为0本,1为1~10本,2为11~20本,3为21~50本,4为51~100本,5为101~200本,6为201~500本,7为500本以上。

孩子是否参加过课外补习为二分变量,0为没有上过补习班,1为上过补习班。

孩子是否参加过志愿者活动为二分变量,0为没有参加过,1为参加过。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子女是否属于中产阶层家庭,该变量为二分变量,0为否,1为是。目前关于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采用了受访者的职业类型、去年全年总收入、去年全年总支出3个指标对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进行了区分,这一标准显然更偏重于职业和经济标准。根据此种标准,如果受访者为中产阶层,则把受访者所在的家庭阶层属性视为中产家庭。由于本研究将此次调查针对中产阶层的适应性区群抽样样本纳入进来,因此最终的分析样本中中产家庭的比例较高,共有623个中产家庭进入到分析中来,约占全部分析家庭样本的67.9%。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了孩子性别、家庭中就读中小学的孩子数、孩子目前上学阶段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其中,孩子的性别为二分变量,0为女孩,1为男孩。家庭目前正在就读中小学的孩子数为二分变量,0为1个,1为2个及以上。孩子目前的上阶段为分类变量,0为小学,1为初中,2为高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主要通过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

水平来测量,其中,使用父母亲较高一方的受教育年限来表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而用家庭年收入的

数来衡量家庭收入情况,两个变量均为连续变量。变量及变量基本构成情况详见表 1。

表 1 变量及样本描述

变量名称	类别/指标	总体	中产	非中产
家庭年人均教育支出	均值	5 441.1	6 933.0	2 114.2
	标准差	9 717.4	11 283.8	2 268.7
家庭藏书量(连续)	均值	177.7	211.6	102.2
	标准差	414.1	477.7	192.1
孩子是否参加过课外补习	是	56.3	62.2	43.1
	否	43.7	37.8	56.9
孩子是否参加过志愿者活动	是	30.8	33.1	25.7
	否	69.2	66.9	74.3
孩子学业成绩	均值	3.7	3.8	3.6
	标准差	0.7	0.7	0.7
孩子性别	男孩	54.7	54.6	54.9
	女孩	45.3	45.4	45.1
家庭就读中小学的孩子数	1 个	83.7	82.4	86.7
	2 个及以上	16.3	17.6	13.3
孩子目前上学阶段(%)	小学	52.8	53.2	51.9
	初中	25.1	23.9	27.7
	高中	22.1	22.9	20.4
父母较高受教育年限	均值	13.7	14.5	11.9
	标准差	3.2	2.9	3.0
家庭年收入(取对数)	均值	12.0	12.4	11.1
	标准差	1.3	1.3	0.6
样本量		1 095	756	339

数据来源: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

(三) 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描述性统计分析主要是对中产与非中产家庭在不同因变量上的分布进行统计描述和比较,并报告了双变量的差异性检验结果。

同时,本文使用了不同的多元回归方法,对 2 种不同阶层的家庭之间以及 2 种家庭内部教育投入状况的差异进行了模型检验。在模型分析部分,针对不同的因变量,本文采取了不同的多元回归方法。针对家庭年人均教育支出的对数、家庭藏书量的分析,由于因变量为连续型变量,故本文使用了一般线性回归(OLS)模型。针对因变量为孩子是否参加过课外补习是否做过志愿活动,且由于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本文采用二分 Logit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 描述性分析

表 1 同时描述了本文关注的家庭教育投入的

4 个维度在总样本、中产家庭和非中产家庭 2 个子样本中的分布情况。从结果可以看出,在家庭年教育支出方面,中产家庭的年人均教育支出约为 6 933.0 元,非中产家庭约为 2 114.2 元,中产家庭约是非中产家庭的 3.3 倍,差距非常明显。在家庭藏书量上,所有家庭的藏书量平均约为 178 本,其中中产家庭平均约为 212 本,非中产家庭平均约为 102 本,中产家庭是非中产家庭的 2 倍多。在孩子是否参加过课外补习上,平均约有超过六成(62.2%)的中产家庭子女曾经参加过课外补习,非中产家庭的子女曾经参加过课外补习的比例仅有四成多(43.1%),二者相差接近 20 个百分点。在孩子曾参加过志愿者活动比例上,中产家庭同样高于非中产家庭,不过二者的差距并不太大,中产家庭平均约为 33.1%,非中产家庭平均约为 25.7%,二者百分比差仅约为 7.4。

对待上述两类家庭在教育投入不同方面的差异,本文还初步进行了双变量的差异性检验,检验结果分别为:教育支出 t 检验结果为 $t = -7.791$, $p <$

0.001; 家庭藏书量 t 检验结果为 $t = -4.071$, $p < 0.001$; 参加课外补习的卡方检验结果为 Pearson $\chi^2(1) = 34.7019$, $p < 0.001$; 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卡方检验结果为 Pearson $\chi^2(1) = 6.024$, $p < 0.05$ 。通过上面描述性的对比可以发现, 中产家庭在家庭教育投入水平上总体要明显好于非中产家庭。

(二)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表2显示了家庭教育投入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1~模型4对应的因变量分别为家庭年人均教育支出、家庭藏书量、是否参加过补习、是否参加过志愿者活动。结果显示: 控制了其他因素后, 在家庭教育支出、家庭藏书量、是否参加过补习3个方面, 中产家庭与非中产家庭的教育投入存在显著差异。相比于非中产家庭, 中产家庭的年人均教育

支出更多, 家庭藏书量更大, 子女参加课外补习的可能性更大, 这一结论与前文描述性检验的结果一致。这说明中产家庭在教育上的经济投入更多, 具备更好的家庭文化环境, 也更加注重孩子的课外补习。在本研究选取的家庭教育投入的4个指标上, 唯一例外的是在是否参加过志愿者活动上, 虽然中产家庭的子女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可能性大于非中产家庭, 但是这种差异并未构成统计意义的显著性。前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已经表明, 分别仅有1/3的中产家庭子女以及1/4的非中产子女曾经参加过志愿者活动, 这一比例远小于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 这说明在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的培养上, 我国的家长仍旧更加看重学业教育投入, 在社会性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不够。

表2 家庭教育投入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全部家庭子女样本)

变量	模型1 教育支出对数	模型2 家庭藏书量	模型3 参加过课外补习	模型4 参加过志愿者活动
中产家庭 ^a	1.274 ^{***} (0.156)	0.431 ^{***} (0.117)	0.531 ^{***} (0.160)	0.190(0.179)
父母较高受教育年限	0.013(0.022)	0.197 ^{***} (0.016)	0.053 [*] (0.022)	0.056 [*] (0.025)
家庭年收入对数	0.337 ^{***} (0.055)	0.139 ^{**} (0.041)	0.139 [*] (0.060)	0.051(0.063)
男孩 ^b	-0.010(0.124)	0.036(0.093)	-0.100(0.128)	-0.215(0.138)
2个及以上孩子读中小学 ^c	-0.075(0.170)	-0.048 [*] (0.127)	-0.405 [*] (0.174)	-0.191(0.197)
孩子目前上学阶段 ^d				
初中	0.280 [*] (0.150)	0.018(0.112)	0.797 ^{***} (0.157)	1.027 ^{***} (0.165)
高中	0.746 ^{***} (0.157)	0.382 ^{***} (0.118)	0.745 ^{***} (0.164)	1.475 ^{***} (0.169)
常数项	2.222 ^{***} (0.631)	-0.869 ^{***} (0.473)	-2.739 ^{***} (0.684)	-2.856 ^{***} (0.731)
R^2	0.178	0.228		
Log likelihood			-704.269	-623.435
自由度	7	7	7	7
P	0.000	0.000	0.000	0.000

注: 1. 样本量 $N = 756$ 。2. 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3.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4. 各变量的参照组如下: a. 非中产家庭; b. 女孩; c. 家庭有1个孩子在读中小学; d. 孩子目前上学阶段为小学。

在控制变量的影响方面,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各项子女教育投入情况影响作用非常显著, 总体说来, 父母的受教育背景和经济情况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比较看, 家庭经济收入对教育支出的正向影响作用更明显, 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是否参加过志愿者活动联系密切, 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 其子女越有可能参加志愿者活动。子女性别差异不会影响到家庭教育投入的差异。孩子就读的学习阶段越高, 教育支出越多, 家庭藏书量会逐渐增加, 子女参加课外补习的可能性增加, 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表2的分析结果表明: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各项子女教育投入表现出了较为稳定的影响效果, 为了进一步检验阶层内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以考察阶层内家庭教育投入上的差异性, 表3和表4分别呈现了分析样本中中产家庭和非中产家庭子女教育投入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5~模型8、模型9~模型12与表2中的模型1~模型4的设置保持一致。表3分析结果显示: 总体上看,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教育投入同样表现出了较为稳定的正向影响作用。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 家庭年收入越多, 家庭教育支出越多, 家庭藏书量越丰富,

进行家庭课外补习的可能性就越大。表 4 关于非中产家庭子女的分析呈现出与表 3 大致相同的结果。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中产阶层内部和非中产阶

层内部的子女教育投入由于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而表现出差异性。

表 3 家庭教育投入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中产家庭子女样本)

变量	模型 5 教育支出对数	模型 6 家庭藏书量	模型 7 参加过课外补习	模型 8 参加过志愿者活动
父母较高受教育年限	0.058 ^{***} (0.028)	0.200 ^{***} (0.019)	0.028(0.028)	0.030(0.030)
家庭年收入对数	0.256 ^{***} (0.048)	0.143 ^{***} (0.042)	0.145 ⁺ (0.063)	0.132 ⁺ (0.074)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2	0.070	0.165		
Log likelihood			-484.497	-442.380
自由度	6	6	6	6
P	0.000	0.000	0.000	0.000

注: 1. 样本量 $N=756$ 。2. 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3. ^{***} $p<0.001$ ^{**} $p<0.01$ ^{*} $p<0.05$ ⁺ $p<0.1$ 。4. 各变量的参照组如下: a. 非中产家庭; b. 女孩; c. 家庭有 1 个孩子在读中小学; d. 孩子目前上学阶段为小学。5. 限于篇幅,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未给出。

表 4 家庭教育投入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非中产家庭子女样本)

变量	模型 9 教育支出对数	模型 10 家庭藏书量	模型 11 参加过课外补习	模型 12 参加过志愿者活动
父母较高受教育年限	-0.097 [*] (0.047)	0.196 ^{***} (0.030)	0.100 [*] (0.039)	0.130 ^{**} (0.048)
家庭年收入对数	1.356 ^{***} (0.260)	-0.059(0.167)	0.178(0.226)	-0.547(0.238)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2	0.111	0.144		
Log likelihood			-216.450	-169.187
自由度	6	6	6	6
P	0.000	0.000	0.000	0.000

注: 1. 样本量 $N=339$ 。2. 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3. ^{***} $p<0.001$ ^{**} $p<0.01$ ^{*} $p<0.05$ ⁺ $p<0.1$ 。4. 各变量的参照组如下: a. 非中产家庭; b. 女孩; c. 家庭有 1 个孩子在读中小学; d. 孩子目前上学阶段为小学。5. 限于篇幅,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未给出。

四、结论与讨论

随着中产阶层的出现和壮大,这一群体的子女教育问题也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本文使用“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从家庭教育支出、家庭文化环境、课外补习参与、志愿者活动参与 4 个方面对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家庭教育投入状况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 2 个阶层内部不同家庭之间在子女教育投入上的差异。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与非中产家庭相比,中产家庭的教育投入优势非常明显。具体说来,中产家庭的教育支出水平更高,家庭文化藏书量更为丰富,子女参加课外补习的可能性更大。这一结论说明家庭教育投入在 2

个不同阶层之间存在明显差距,阶层间的“鸿沟”仍然存在。教育作为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动力来源,在缓解或者改变着由于出身导致的不平等的同时,又在塑造着不平等。中产阶层家庭会利用各种资源优势,进行更多的教育投入,以确保子女获得较多的教育机会,这又会进一步拉大中产阶层与较低阶层的教育差距。

第二,在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内部,不同家庭之间在子女教育投入上都同样存在着差异与分化,无论“鄙视”背后的心态如何,“鄙视链”描述的客观事实的确存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导致不同家庭在教育投入上也存在差别。具有更高收入水平和更好教育背景的家庭,对子女的家庭投入总体上表现出更高水平。

第三,在本研究考察的家庭教育投入的第4个维度即志愿者活动参与上,2类家庭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但是通过对2类家庭子女子样本的检验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该变量也具有正向影响。这一方面说明,相比于学业教育,中国家长对子女的社会性教育意识普遍还不够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具有良好受教育背景的父母相对做得更好。

通过阶层间和阶层内的比较可以发现,家庭教育投入的差异不仅存在于中产与非中产之间,也同样存在于阶层内部的不同家庭之间,“教育鸿沟”与“教育鄙视链”并存。每个家庭的教育投入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渐变的等级分化序列”,其在序列中的位置主要由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因为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家庭教育投入的意愿、能力、程度和水平。

囿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并未给予中产家庭教育投入面貌一个更为全面的呈现,比如本文并未纳入关于家庭教养方式的分析,实际上家庭教养也是家庭教育投入的一个重要维度,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不足。不过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至少可以发现,相

比于较低社会阶层,中产阶层具有更为重视教育投入的倾向和行为,这与中产阶层的构成多为高学历人群有关系,他们更加看重教育回报,更与这些家庭具备较大的教育投入能力有关系^[30]。但是,这种对待教育的共享态度和行为是否已经构成了一种稳定的中产阶级的集体意识或者阶层性情,国外很多研究曾对中产阶层和其他阶层在教养模式上的差异进行过概括比较,对于这些结论的适用性在中国仍旧存在争议,比如在父母教养方式问题上,基于本土样本的分析曾证实过不同阶层教养模式的差异^[31],但是也有研究指出:中国城市居民并没有呈现出像西方那样的中产阶层以权威型教养为主,底层以专制型或放任型教养为主的分化模式^[20]。这些矛盾性的结论,一方面是由于中产阶层自身的复杂构成和阶层边界还较为模糊,因此阶层认同和内群意识尚不成型;另一方面也与不同研究选取的测量指标有关系,比如家庭教养方式涵义非常丰富,不同研究仍有可能只是测量到了家庭教养概念的部分内容,这些都有待未来进一步更加全面的探讨。

参考文献:

- [1] 李春玲. 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状况[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1(1): 75-87.
- [2] HAVEMAN R H, WOLFE B L. Schooling and economic well-being: the role of nonmarket effects[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84, 19(3): 377-407.
- [3] GARG R, KAUPPI C, LEWKO J, et al. A structural model of educational aspirations[J]. Journal of Career Development, 2002, 29(2): 87-108.
- [4] FEATHERMAN D L, HAUSER R M. Opportunity and chang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 [5] SHAVIT Y, BLOSSFELD H. Persistent inequality[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3.
- [6] RAFTERY A E, HOUT M. 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xpansion, reform, 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 1921-75[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3, 66(1): 41-62.
- [7] LUCAS S R. 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ducation transitions, track mobility, 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1, 106(6): 1642-1690.
- [8] 李春玲.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J]. 社会学研究, 2010(3): 82-113.
- [9] 刘精明. 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J]. 中国社会科学, 2008(5): 101-116.
- [10] 吴愈晓. 教育分流体制与中国的教育分层(1978—2008)[J]. 社会学研究, 2013(4): 179-202.
- [11] BECKER G S.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70(5): 9-49.
- [12] LIU A, XIE Y. Influences of monetary and non-monetary family resources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in verbal ability in China[J].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 Mobility, 2015, 40: 59-70.
- [13] LAREAU A.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family-school relationship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capital[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87, 60(2): 73-85.
- [14] 刘保中, 张月云, 李建新. 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观念与家庭教育期望[J]. 青年研究, 2014(6): 46-55.
- [15] PIERRE B.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M]//KARABEL J, HALSEY A H.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Bost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487-511.
- [16] 孙远太. 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上海城镇居民调查[J]. 青年研究, 2010(2): 35-43.
- [17] SAMPSON R J, LAUB J H. Urban poverty and the family context of delinquency: a new look at structure and

- process in a classic study[J]. *Child Development*, 1994, 65(2): 523-540.
- [18] 安妮特·拉鲁. 不平等的童年[M]. 张旭,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3.
- [19] 陈曙红. 中产阶级教育传承中的文化再生产问题——以南京市为例[J]. *唯实*, 2008(8-9): 143-147.
- [20] 洪岩璧, 赵延东. 从资本到惯习: 中国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阶层分化[J]. *社会学研究*, 2014(4): 73-93.
- [21] TILAK J B G.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expenditure on education in india: a preliminary analysis[J]. *Asian Economic Review*, 2002, 44(2): 326-332.
- [22] 楚红丽.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分析[J]. *教育科学*, 2008, 24(2): 9-15.
- [23] 阮福金, 周晖, 李峰. 家庭文化环境对幼儿语音意识的作用[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6, 22(1): 13-17.
- [24] EVANS M D R, KELLEY J, SIKORA J, et al. Family scholarly culture and educational success: books and schooling in 27 nations[J].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 Mobility*, 2010, 28(2): 171-197.
- [25] STEVENSON D L, BAKER D P. Shadow education and allocation in formal schooling: transition to university in Japa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2, 97(6): 1639-1657.
- [26] 丁小浩, 翁秋怡. 权力资本与家庭的教育支出模式[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5, 13(3): 130-142.
- [27] 梁烜. 中小學生志愿服务项目的选择与设计[J]. *北京教育(普教版)*, 2016(9): 34.
- [28] 黄亨奎, 张宝臣, 李揆殷. 中韩小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比较研究[J]. *比较教育研究*, 2014(6): 63-68.
- [29] 梁玉成, 张海东. 北京、上海、广州社会中间阶层调查报告[M]//李培林, 陈光金, 张翼. 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89-218.
- [30] 宋国恺, 武天, 李冬. 家庭地位、人力资本与政策对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的影响[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5): 71-78.
- [31] 刘保中, 张月云, 李建新.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教育期望: 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5, 13(3): 158-176.

"Wide Gap" and "Contempt Chain": Class Differences in Family Education Investment: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LIU Baozho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class groups have highlighted the issue of children's education in this group.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Living Conditions of Residents in mega-cities, this paper compared the family education investment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non-middle class, from the aspects family cultural environment, family education expenditure,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and volunteer activ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non-middle class families, the education investment of the middle family is much better. Meanwhile, within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non-middle class, there is also a gap between different families in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investment. "Education Gap" and "Contempt Chain" coexist. Influenced by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the family, the educational investment level of children from different families actually constitutes "a gradual differentiation sequence".

Key words: residents' life in mega-cities; family education investment; middle class; class differences; education gap

(责任编辑 刘 健)